

十七世纪中国

(一) 明末中国大势

康乾盛世是一个由大乱走向大治，达于鼎盛的漫长历史进程。如果从大乱发生的时间算起，约当明万历中期即 16 世纪末，中经 17 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动乱、大震荡，到康熙五十年（1711 年）进入“盛世”，已历百余年。为阐述这一进程，探索它的内在规律，康乾盛世出现的必然性，我们不得不追溯历史，把它翻到明万历中期的编年史，同时再把它置于世界的范围加以考察，就会对康乾盛世获得必然性的认识。

卷

一

在人类编年史上，17 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巨变的又一个划时代的水分岭。以西欧为先导，封建制正在迅速解体，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前夜。自中叶为开端，英国率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，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，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曙光。不论

在地球的哪个地方，哪个国家；不论他们的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无疑宣告人类的新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，标志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以资本主义为旗帜的发展阶段。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，新的文明，它的社会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，都是不容置疑的。

当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同封建统治势力进行阶级大搏斗之际，在地球的另一方——东方的中国，也在经历着规模远比英国更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内乱。但两者性质不同，中国内乱主要表现为农民大起义的爆发，满族的勃兴，打破了明朝的一统天下，使她陷入了 200 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社会危机之中。

这场直接危及明朝生死存亡的大乱，积数十年之酝酿，由微入渐，终成天翻地覆之势。

纵观中国历史，每代王朝兴起，都曾有过各自的辉煌：社会稳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经济繁荣，君主与百姓共享太平之福。明朝也不例外。自朱元璋创建明王朝，迅速进入她的兴盛繁荣时期，史称“永宣之治”。这是指永乐、宣德两朝，继元末之乱，中国重新走上发展道路，达到天下大治。如《明史》所记：“洪武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之际，百姓充实，府藏衍溢”，“上下交足，军民胥裕。”^①特别是永乐中期，“计是时，宇内富庶，赋入盈羨，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，府县仓廩蓄积甚丰，至红腐不可食。”^②这些记录，生动地写实了当时社会繁荣的盛况。

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的年号，历 31 年而终。其孙惠帝朱允炆即位仅 4 年，就被他的叔父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了皇

《明史·食货一》卷七七。

《明史·食货二》卷七八。

位 改年号永乐 在位 22 年而崩；仁宗朱高炽立年号洪熙，只年余便短命而亡 继其位者 是宣宗朱瞻基 年号宣德 也只有 10 年。计以上祖孙五帝 共为 67 年。这就是说，明朝的空前繁荣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才出现的，的确来之不易。

自宣德以后，百余年间，明朝基本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。尽管朝廷不时出现政争，外有蒙古侵袭，和与战时断时续，并没有给国家造成重大危害，即使遭遇险情，也转危为安。在封建专制的时代，国家的安危，社会的发展与否，多有赖于君主的作为和众臣属的辅佐。公平地说 明朝共历 16 帝 除了朱元璋、朱棣、朱瞻基等少有的几个皇帝颇多作为，富有才智，其余多属平庸之辈，不乏荒唐酒色之徒。但明朝这座大厦何以没有速毁？特别是到了明朝后期，政治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仍然坚持了数十年，一个重要原因，这就是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为他们的后世子孙制定了完备的制度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虽几经动荡 甚至摇摇欲坠 硬是挺得住，国家机器照旧运转。

明朝走下坡路，已现衰亡征兆，始于神宗朱翊钧，天下大乱之源即自神宗中期以后酿成。

神宗在位最久，长达 48 年。他即位时才 10 岁 还是一个不懂政事的孩子。幸赖名相张居正替他掌政，天下太平。张居正执政期间，大力实行社会改革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严格考核，清除贪官污吏，起用廉官，吏治澄清；他推行一条鞭法，丈量全国土地，抑制豪强，裁减宗室俸禄 扩大税收来源 还采取一系列措施 巩固边防。他的改革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。正处在江河日下的明朝开始有了转机；国势几于富强^①。万历十年（1582 年）张居正去世 神宗已

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卷二一。

经 20 岁正式亲政。他上台不久就把张居正打成“逆臣”，抄家掘墓，将其家人充军戍边，并布告天下，声讨他的“罪行”。同时，废除了他的改革。明朝形势急转直下。

神宗是个荒淫残暴的酒色之徒，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，根本不理朝政。自朱元璋以后，皇帝有每天三次会见廷臣议事的规定，也有一天一次会见的，而神宗却一连 20 年不上朝召见大臣，不批复大臣们的请示报告。大臣们急得团团转，只得向他恳求，说：“皇上不批复章奏报告，先朝从未有过，而今却大半扣留，不批不发，一旦国家有大事，被人截取，向外张扬，谁能澄清？请从现在起，凡批复不及的，尽可以当面写一纸条，转达给有关部门和大臣照办。君臣虽不能面谈，但总可以杜绝上下受人蒙蔽。”①神宗置之不理，仍是我行我素。就是各部门缺官，无人负责，他也不补、不任命，任凭无人办事。

遍查中国历代皇帝，就是那些荒唐淫乐的帝王也没有 20 年不上朝的，在这方面，神宗创下了最高纪录！

神宗身为天下之主，毫无体恤百姓疾苦之念，只是一味地挥霍金钱。仅举一例：他一次采办珠宝，竟用去白银 2400 万两，相当全国 6 年赋税的总额！这就是说，他一个人享用了全国 6 年财税的总收入。据粗略统计，仅数年之间，为他建陵寝费用几百万两，织造费用几百万两，派人大规模采木，修盖宫殿，又各几百万两。同时，用兵宁夏费几百万，黄河溃决，用去筑堤等设施费几百万……

神宗不顾百姓死活，只要他缺钱，就向百姓劫夺，贪官污吏、地方豪绅乘机趁火打劫，民不安生。陕西、甘肃地区本来气候寒冷，土

《明史·吕坤传》卷二二六。

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三五“万历中缺官不补”。

地瘠薄，生活实在困难。但朝廷下令，责成该地织造花绒布，献纳皇室。织造这种布工艺要求严格，如提花、染色，工匠日夜无休地工作，而“千手经年不成一匹”，逼得当地百姓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。山西地区承造“蘇”，每年在定额之外，另加造不已，百姓已无力承受。江西饶州的磁器、新疆的“回青”“玉石”，本来不是急需的东西，朝廷也催要，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。以采伐木而言，神宗为营修乾清宫等宫殿，便指派四川、湖南供应木材。所采之木，其粗达丈八之围，生长期已有百年，都处深山穷谷之中，人烟绝少，蛇虎横行。特别是毒雾弥漫，每当春夏之际，瘴疠肆虐，对采木者生命构成严重威胁。伐倒一棵巨树，“千夫难移”，一遇险阻，必致死伤。所以，四川人说：“入山一千，出山五百。”生死各半。一谈及伐木，湖南、四川百姓无不哽咽痛哭^①！

但为害最烈者，莫过于矿税之强征。此为了一项新增的税收，以开矿为名，行掠夺之实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神宗派出太监充任矿税监，先在京畿地区开矿，很快又命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浙江、陕西等地开采，榨取钱财，用来充作营修乾清、坤宁诸殿的费用。太监分赴各地，招收当地无赖地痞为爪牙，胡作非为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群臣纷纷上疏，劝阻开矿。以凤阳巡抚李三才为代表，痛陈矿税之弊，言辞最为激烈。他说：自矿税繁兴，万民失业。陛下为万民之主，不但不给他们衣穿，却把他们的衣裳夺去；不但不给他们饭吃，却把他们吃的也夺去。征税之使，急如星火，搜刮之令，多如牛毛。今天某矿得银若干，明天又加征银若干；今天某税得银若干，明天某项税收又加征银若干；今天某官员因阻挠开矿而被逮捕，明天

《明史·吕坤传》卷二二六。

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卷二〇。

某官以怠惰矿税而被罢官。上下相争，唯利是图。太监四布各处，加上无赖亡命之徒，如一群群虎狼，为害百姓。在湖南，太监指使爪牙，沿途不惜掘百姓坟墓，直至掘到矿为止。皇上爱珠玉之宝，百姓只爱温饱，皇上爱“万世”，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和小孩。为什么皇上只想黄金堆成山，而不让百姓有糠粃升斗的点滴储积？他奋力疾呼：看看以往的记载，朝廷有过这样的政令、天下有过这般悲惨的景象而不大乱的吗？

有汤显祖的诗为证：

中涓指宦官，凿空山河尽，
圣主指万历，求金日夜劳；
赖是年来稀骏骨（喻贤才），
黄金应与筑台高②。

是时“税监遍天下，小民涂炭已极。”恰如诗人诗中所说：“自从貂虎指太监，横行后，十室金钱九室空。”又一首写道：“青天处处横珰虎，指太监，鬻女陪男偿税钱。”③

鉴于太监充税监为害天下，群臣要求撤税监的奏章，如雪片一般送达神宗面前，他一概不理，扣留不发。

税监为害地方，竭泽而渔，已把百姓逼向死亡。南阳（今属河南）诸府已经是连年灾荒，有半数百姓逃亡，没有逃亡的还得供应矿工饮食、官兵口粮，大多累死。在一些地方，已无矿可开，就强令百姓缴纳白银充数，“计朝廷得一金，群县费千倍！”百姓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向万恶的税监展开了武力反抗。一首《税官谣》已发出了抗击税官的怒吼：“千人奋挺出，万人夹道看。斩尔术，揭尔竿，

谷应泰：《明史记事本末》卷五“矿税之弊”。

米治国、周惠泉等：《元明清诗文选》页六五～六七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
《元明清诗文选》，页六九。

随我来 杀税官！’^①从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始，凡有税监、税使驻在的地方，都成了百姓攻击的目标。这一年，首先从山东临清传来市民暴动的惊人消息，拉开了反税监斗争的序幕。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税使的官衙，击毙其参随人员 34 人，同年末，汉阳（今湖北汉阳）市民击伤税使陈奉；二十八年，南京、北京地区“民饥盗起”；二十九年，武昌民变，税使陈奉及参随 6 人被杀，巡抚公署被焚烧；不久，苏州民变，管织造的太监孙隆与随从数人被杀；三十年，云南腾越百姓杀死税监委官；三十四年，云南人怒杀税监杨荣，连他的尸首也给焚烧了。

广大百姓，从乡村的农民到城镇的市民都已经活不下去了。从万历十年以后，“无岁不灾，催科如故。”百姓“冻骨无兼衣，饥肠不再食”被迫四处逃难，土地弃而不种的越来越多，留下的人替逃亡的缴纳税粮，活着的人承担死者的徭役。国家的“财用耗竭”不但没有资金周济他们，还得继续榨取，以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。

到万历中期，明朝已走过了 200 余年的漫长道路，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，社会弊端层出迭现，险象环生。整个社会已陷入空前的危机。凡稍有点见识的人无不忧心忡忡，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明王朝的日益沉沦……

其中，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尖锐更透彻地阐明当前局势极端危险。他就是左佥都御史吕坤。这是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 年），他向神宗上了一道奏章，痛陈“天下安危”，开宗明义，概述天下形势：“今天下之势，乱象已形，而乱势未动，天下之人，乱心已萌，而乱人未倡，今日之政，皆播乱机，使之动，助乱人，使之倡也。”^③这番话是

《元明清诗文选》页七一。

《明史·神宗本纪二》卷二一。

《明史·吕坤传》卷二二六。

对万历中期政治局势的最准确的概括“大乱的局面已成‘形’”只是还没有乱起来。老百姓已萌发了“乱心”，只是还没有人振臂一呼。目前的政治都为大乱播下了种子，促使全国乱起来，帮助作乱之人带头作乱。

吕坤不愧是目光敏锐、远见卓识的政治家。就当时而言，他已看出明朝危机四伏、陷入险境。可以说，吕坤是第一人！他不幸而言中，后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正确无误。昏聩的神宗读了吕坤的奏章，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没有引起丝毫警惕，无动于衷。直到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他临死时，才略有醒悟，追悔矿税事，留下遗言：罢天下矿税，各处任命的矿监——太监都撤回皇宫。可惜为时已晚，他的后继者回天无力，明朝迅速走向灭亡！

清朝修《明史》时，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：“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”^①。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，也为今人所认同。换句话说，天下大乱即始自神宗，自此一天天乱下去，直至清朝重新统一全国，大乱才结束。如从吕坤指出“乱形”已成的万历二十五年算起，至清止乱，也有60多年的时间。

神宗死后，又历光宗、熹宗、毅宗三朝。光宗即位仅月余去世，对局势的变化无足轻重，关键是熹宗，虽说他在位只有7年，但对明朝生死存亡关系极大。如果他能惩前毖后，刷新神宗弊政，明朝或许还有希望，岂料神宗长孙熹宗同乃祖一样，追逐声色狗马之乐，重用太监魏忠贤与奶妈客氏，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。

魏忠贤本系一无赖出身，目不识丁，为人阴险毒辣，客氏淫荡而心狠，两人结为死党，狼狈为奸。他们每天都诱使熹宗嫖娼优玩

方伎不理政务而独操国家大权。他们为非作歹，凡不合己意者必排挤出朝廷，谁敢反对，必置于死地而后已。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主清流，终被魏、客残酷打击，又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兵败辽西广宁之机，谋兴大狱，不仅将其处死，还把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六位重臣也牵进“熊案”，置于狱中害死，尚书李宗延等 50 余人皆被削职，逐出国家的政治生活。大学士、兵部尚书孙承宗被魏排挤，告老还乡；敢于同后金战斗的名将袁崇焕也被迫辞职回家。昏庸的熹宗对魏、客言听计从，任其所为。魏客集团大施淫威，连民间偶语触犯他们的话，立遭逮捕，加以虐杀，甚至“剥皮割舌”。被杀的人“不可胜数”^③。朝廷内外，皆为魏、客及同党所把持，正直大臣所存无几，敢怒不敢言。依附他们的人齐声称颂，纷纷在各地为魏建“生祠”，像神一样供奉。熹宗频频给他加官进爵，封为“上公”。一个侍奉帝后的奴仆，竟权倾朝野，登峰造极！

国家政治生活暗无天日。

经济继续败坏，水旱频仍，黄河决口，百姓生活绝望。各地城乡民变、兵变、农民暴动不断发生，社会激烈动荡起来。天启六年（1626 年）八月，陕西流民揭竿而起，由此星星之火，不出几年，终于发展成燎原大火！

神宗晚年，即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 年）创建于公辽宁东部山区的后金政权，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，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——满族崛起，一跃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，向明朝展开了猛烈攻击，相继夺取了抚顺、开原、铁岭等明朝边防重镇。熹宗即位后，后金又连夺

《明史·魏忠贤传》卷三〇五，页八五三。

指天启元年（1621）熊廷弼主持辽西军务，与广宁巡抚王化贞意见分歧，贻误军机，被后金打败，自退山海关。魏忠贤以熊不附己，即借口将熊处死。

《明史·魏忠贤传》卷三〇五 参见李逊之：《三朝野记》卷二。

沈阳、辽阳、广宁（辽宁北镇）及辽南至旅顺等地区。后金已占领辽东，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。被视为京师的“左臂”——辽东，已为后金所截断，明朝的危机日益加深。

自万历中期，神宗已为明朝打开了死亡之门，而熹宗 7 年中，进一步推波助澜，局势迅速败坏，经济濒于崩溃，农民暴动、起义乱于内，地处东北的后金攻于外，终于形成全国规模的空前大动乱。明朝的灭亡，势所必然，只是时间问题。

明末社会的大动乱，究其根源，依然是根植于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。由神宗、熹宗两朝播下的“乱机”，至崇祯朝发展成全国农民大起义，无疑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全面爆发，进而酿成公开的武装对抗，使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陷入周期性的危机。

17 世纪的中国，还是一个正在向前发展中的封建社会的大国。自朱元璋建国到神宗、熹宗二朝，历 200 多年，在政治制度上，已形成一套比历代更完善、更严密、更专制的中央集权制。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体制，仍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。与历代不同的是，商品经济有所发展，这主要是在南方江浙地区已稀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，显示出传统的封建结构已开始解体的迹象。无疑，它是从中国封建社会漫漫长夜中透露出来的一丝曙光。

但在西欧，这一曙光的出现比中国还要早些。照马克思的说法，“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，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，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，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”的。而在中国，这个时期远没有到来。到 17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西欧的封建制度正处于迅速瓦解过程中，特别是在英国，已

临近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是“萌芽”状态，它在高度封建专制与超经济的双重压制下，举步维艰，难以生长起来，因而无法形成政治上的独立势力。这就决定了 17 世纪 20 年代前后中国开始的大动乱，其性质不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诸矛盾的冲突，无论是兵变、民变、农民暴动，直至发动大起义，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“农民运动”，因而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，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始于万历中期至熹宗朝的社会动乱，将沿着封建社会的自身轨道继续向前发展，进入崇祯朝，大乱达于极点。所谓物极必反，乱极而治，预示着一个新的大治局面将要出现，尽管距离这个时代还很遥远，但迟早会到来的！

（二）农民摧毁明朝

继熹宗之后，崇祯登上了皇位。他的名字叫朱由俭，是短命皇帝光宗第五子，而熹宗是他的长兄。熹宗本来应有自己的儿女，但他的后妃一怀孕，就被他的奶妈客氏给秘密把胎打掉，所以，他无子继承自己的皇位，他年纪轻轻的，才 24 岁，就一命呜呼了。死前，只好把自己的弟弟信王由俭请出来，做他的皇位继承人。由俭即位，选定“崇祯”为他的年号。

信王朱由俭在即位的喜庆之中，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他竟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，而且弄得国破家亡，妻离子散，连他自己都死无葬身之地！

《三朝野记》卷四，“崇祯朝纪事”。

从他刚即位的举措来看，他的确是想重整朝纲，刷新政治。即位还不到一年，就针对魏忠贤、客氏集团采取措施，逐步削除其权力，下令派往各边镇监军的太监一律撤回皇宫。魏忠贤眼见大势已去，畏罪自缢而死。

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春，由俭为泄臣民之愤，命将魏忠贤和他的死党已故崔呈秀戮尸，以示严惩；将客氏“掠死，仍戮尸凌迟”。^②接着，魏客党羽纷纷被逮惩治，为被他们陷害致死的文臣武将及其株连的家属千百人平反冤狱，恢复名誉，厚加抚恤。同时起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大臣，参谋机务……

朱由俭即位初政，刘除奸恶，殚心治理，给人以万象更新之感。朝野上下抱以期待的心情，想望局势好转，社会安定。可惜“大势已倾，积习难挽”，尤其是天不作美，旱灾频仍，到处闹饥荒，民饥兵饷，所谓“兵荒四告，流寇蔓延”，兵变、暴动、起义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，更有关外清军虎视眈眈，步步进逼，真是天灾人祸，兵连祸结，遂至溃烂而莫可救。^③这的确是朱由俭的不幸。命运注定他与明朝共同覆没！

明末天下大乱，首先从陕西开始。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陕西发生大旱，次年即崇祯元年，继续大旱。延安府地区，一年中没下过一滴雨，“草木枯焦”。八、九月间，百姓争抢采摘山间蓬草而食。十月以后，蓬草已尽，便剥树皮而食。到年终，树皮吃尽，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石块性冷味腥，吃一点就饱了，过了几天，腹胀下坠而死。一些百姓不甘心饿死，开始相聚为“盗”，劫掠富户。他们说：“死于饥饿，与死于盗是一样的，与其坐而饿死，何不为盗而死，还做个饱死”

《明史·魏忠贤传》卷三〇五。

《三朝野记》卷四“崇祯朝纪事”。

《明史·庄烈帝纪》卷二四。

鬼呢！'在安塞地方，情况更惨。在城西堆放粪土的地方，每天总有一、二个弃婴，至次日晨，所弃之婴踪影皆无。更奇怪的是，小孩或独行的人一出城外，就再也不见人影了。原来，那些弃婴或丢失的人，都被饥民杀死，煮人肉当饭吃，人骨当柴烧。吃了人肉的人，过了几天，面目红肿，内发燥热，很快也死了。于是，死的人到处都是，臭气熏天。在县城外挖掘大坑，每坑可容数百具尸体，用以掩埋遗骸。在这种悲惨境况下，当地官府还是催要租粮，仅存下来的人，只有一逃而已^①。驻守绥德、宁夏、固原三镇的官兵已缺粮 36 个月！百姓家中空空如也，家无粒米，野无青草，米价腾贵，“军民交困”，所以“穷极思乱，大盗蜂起，劫杀之变，在在在先闻。”百姓为“盗”与逃兵互相煽动，千百成群，“横行于西安境内”，在耀州、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淳化、韩城、蒲城之间；所过放火杀人，劫财掠富，庐舍成墟，鸡犬一空。”经天启至崇祯初，仅数年间，已“养成燎原之势”^②。

在当时朝廷大臣的许多奏疏中，都真实地描绘出陕西连年饥荒、人吃人的可怕景象。就在崇祯元年（1628 年）十一月，延安所属府谷人王嘉胤公开号召，举行起义，饥民、叛卒、逃卒、难民、盗贼争先参加，迅速扩展，起义、暴动遍陕西，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天下大乱“始于此，而卒以亡天下。”^③

据官方记载，崇祯元年以后，二年、四年、六年、七年、九年、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，共 10 年中，山西、陕西持续大旱，蝗虫遍地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农民饥饿无食，疯狂地人吃人，与此同时，河南、山东、南京、北京地区、浙江、湖广（湖南）、宁夏等地也连续大旱，蝗虫猖獗，农民非死即逃。个别地方还闹水灾瘟疫、发生

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五，“马懋才备陈大饥”。

《明季北略》卷五，“南居益请发军饷”。

《明季北略》卷四，“钱文俊激变”。

地震，死者累累，生计断绝。

崇祯时期闹饥荒 持续之久 波及之广 灾害之重 为历代所仅见 所谓“天降奇荒 所以资李自成也！”^①

陕西、山西等省的百姓为了活命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流向他省谋生 于是 便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“流民”造成社会的巨大震荡。但全国遍闹饥荒，何处可以栖身糊口？在他们绝望后，便铤而走险，毅然加入起义，于死中求生！

经年的自然灾害正在摧毁明末的社会经济，特别是在陕西、山西、河南等省 已呈崩溃状态。天灾就像恶魔一样 无情地吞噬着崇祯政权。

天灾伴着“人祸”，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。明末最严重的“人祸”莫过于党争。所谓党争 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 拉帮结伙 党同伐异 相互倾轧 自相残杀。始自明中叶 渐趋激烈 至万历、天启两朝达到了高潮。朱由俭即位初 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“阉党” 党争稍息。但很快党争复燃，愈演愈烈。身处最高统治地位的由俭为其蒙蔽 不辨是非 刚愎自用 辞退正直之士 滥杀无辜 朝政异常黑暗。党争仍然在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进行。

历代所用太监，不过是照料帝后妃日常生活，洒扫庭院而已，足不出宫 各司其职。实际上 他们都是皇家的奴仆 是不可参与国家政事的。由俭一即位，就下令革除前朝重用太监于军政的弊病。不料，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便一改初衷 开始重新起任太监，担任国家军政与财政等各个方面的要职。据载，这一年，他命太监曹化淳提督南京织造、提督东厂，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，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，命太监吕直劳军，以

^①《明季北略》卷五，“马懋才备陈大饥”。

司礼太监沈良佐、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、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，提督京营。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由俭进而把太监派到各边疆军事重地和前线，授给他们监督将帅和军事行动及粮饷的权利，还充当皇帝的“信使”，代表皇帝劳军、转运粮饷、侦探将帅言行，等等，名曰“监军”。他们成了皇帝的“钦差大臣”，将帅们的“太上皇”。经调整后，对他们作如下安排：

王应朝往关宁（指山海关、宁远）；

张朝元往蓟镇东协；

王之心往蓟镇中协；

邵希韶往蓟镇西协；

李奇茂监视陕西茶、马；

吴直监视登岛兵饷；

高起潜监视徽（州）宁（远）；

王坤等分别监视宣府（今山西宣化）大同（今山西大同）

在京中也用太监监督各部门，如，用张彝宪总理户部、工部事务，用唐文征亲督京营军队，等等。

太监本不懂政治、军事，更无理财的才干，但他们借皇帝名义，狐假虎威，高踞各地方督、抚、将帅之上，指手画脚，稍不如意，便向皇帝报告，被告者不是被革职，便被捉拿治罪。逼得督、抚或将帅不得不曲意奉承，极力巴结，甚至双方勾结，蒙蔽皇帝和朝廷。

太监凭借特权，搜刮民财，千方百计巧取宫中财物，索取贿赂，暴敛财富，个个富有。“有明之富不在官，不在民，而皆在诸宦寺及藩邸。”^② 这就是说，太监与封藩各地的朱姓诸王是明朝社会最富

《明朝纪事本末》卷七四，“宦侍误国”。

《黠闻续笔》卷三。

有的人还有由俭不断地给予赏赐 晋级加冠 也是他们增加财富的一个来源。据估计 明末“太监家私何止数百万”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。

太监专横，违法乱纪，打击和迫害不合己意的朝中或边疆大员已引起正直大臣们的愤怒，他们纷纷上奏章反对太监干政，指斥太监的妄行，于是，又引发出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党争。

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疏说：“臣所在工部有公署 中则有尚书 旁列侍郎 这是制度所规定的。但是 让太监张彝宪‘总理’户、工两部 高踞尚书之上 这不是有辱朝廷而亵渎国家体制吗！”

南京礼部主事周镛上疏 不胜感叹地说：“内臣用易而去难 此从来之通患。”

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对太监作威作福，指令各级官员见面先朝拜他们十分不满 上奏章诉说心中不平：“诸臣还没觐见天子 先拜太监，还让士大夫有廉耻吗？当初魏忠贤势力嚣张时，认他为义父的义子、乾儿在夜里趴在地上朝拜，都还感到耻辱，如今光天化日之下 竟向太监朝拜 反倒不感到奇怪 国家自有觐见制度 二百余年未听说有这样的事。所以 我为此叹息。”他参劾的是太监张彝宪等人 张不服 也向由俭申辩。袁继咸又上疏再辩：“知府见巡抚、总督行下属礼，这是典制，地方大员见太监行下属礼，这也是典制吗 地方司员至京 先向吏部报到 这是典制 而先拜谒太监 这也是典制吗 太祖高皇帝 指朱元璋 立法 太监不得参与外事。如果一定用太监约束各级官吏，这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事！”

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十月，工部侍郎刘宗周向由俭发出呼吁：

“今天下缺乏人才，还不至于尽出太监担当重任，他们的实权和地位等于总督，那么，将置地方总督于何地呢？而且小人与太监每每相互标榜，势必造成党争。”^①

类似这样的奏疏，书不胜书。诸臣劾太监，太监劾诸臣，把朝政搅得混沌沌，难见清明，但结果总是太监得胜。因为太监得到皇帝的偏袒，百般保护，而对劝止重用太监的大臣，特别是揭露太监劣迹的人，都受到皇帝的惩罚，轻则训斥，重则降级或罢官。像前边提到的高弘图因与太监不能共事，连上七道奏疏，请求退休，由俭一怒之下，将他削籍为民。周镳刚直不阿，揭了太监的短处，含蓄批评皇帝袒护太监也遭到同样的下场。袁继咸批评太监劣迹，被皇帝痛斥一顿。即使揭发是实，由俭也“不听”、“不问”，听之任之。相反，还极力为其辩解。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由俭任命太监提督天寿山，当天接到命令，当时就出发了。他抓住这种类似的小事，对阁臣们说：“内臣（指太监）即日就道，而侍郎接到命令三日未出，为什么还责怪朕用太监呢？”只要太监想整哪个官员，由俭很快就批准，予以惩治。由俭初政时，改变先朝用太监的政策，不幸的是，他又重蹈覆辙！

明末党争，同时也在朝廷官员之间进行，他们各立门户，各聚集同伙，相互攻击。兵部员外郎痛切指陈党争之祸，说：“当事者借皇上（指崇祯）刚毅，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，借皇上综核，而弛其讼，通握算之能……皇上图治之圣心，为诸臣斗治之捷。”

政治混浊，文武不和，言官攻讦，太监专横，监察失察，崇祯朝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。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内外夹攻下，由俭“用法

《明史记事本末》卷七十四“宦侍误国”。

③ 文秉：《烈皇小识》卷三。